

## 《虚假的事实》：印度民族自我的“寓言”

黎跃进

**摘要：**耶谢巴尔是印度现当代进步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的创作以现实主义的描绘，关注祖国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他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的长篇小说《虚假的事实》，以印度独立前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为背景，通过生动的情节和艺术的形象体系，以文学虚构叙述，重新建构印度的“民族自我”，是后殖民语境中印度民族自我的“寓言”。小说在印巴分治、教族冲突的民族灾难反思中，提出正视现实，清理殖民统治带来的文化后果，革除独立政府新权贵的种种弊政，经过历史风雨的洗礼后，建设一个进步繁荣、平等团结、理性奉献、自力更生、代表民众利益和愿望的新的民族自我。这个“民族自我”在小说主人公达拉与和布兰身上得到“寓言”式的体现，达拉的经历和命运是印度民族的象征性写照，她勤勉温雅、宽容仁慈、正直清廉的性格，是新的“民族自我”的人格化。小说的构思也艺术地体现了寻求“民族自我”的突出特点：在历史框架中虚构情节，民族知识分子聚会，本土风习描写，坚信民族光明前程的结局。小说在表现耶谢巴尔一贯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同时，鲜明地体现了探讨“民族自我”的主题。

**关键词：**耶谢巴尔；《虚假的事实》；民族自我；寓言；后殖民文学

**收稿日期：**2021-02-28

**作者简介：**黎跃进（1957~），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跨文化与世界文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东方文学与文化、中外文学比较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丝路文化视域下的东方文学与东方文学学科体系的建构”（项目编号：19ZDA290）的阶段性成果。

耶谢巴尔（1903~1976）出生在印度北方邦费洛杰，家境清寒，靠母亲做教师的微薄收入维持家计。耶谢巴尔童年上过私塾，十多岁时到拉合尔上中学。中学期间投身民族独立解放事业，1921年中学毕业，他成为激进的政治青年。大学

时期，耶谢巴尔从事反英地下武装活动。大学毕业后，他以教员身份为掩护，积极参与独立运动，成为印度社会主义共和军的领导人，于1932年被英国殖民当局逮捕，关押6年。他在狱中努力学习理论，积极从事创作，开始走上文学道路。出狱后创办《起义》杂志，以此为阵地宣传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40年代初再次被捕入狱，但他没有屈服，5年后出狱，继续从事反殖活动，同时积极创作，成为印度进步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

耶谢巴尔在印度被称为“当代最有造诣的印地语小说巨匠之一。”<sup>①</sup>他一生创作了14部中长篇小说、200余篇短篇小说和大量的政论、时评、回忆性散文，以他对文学的贡献获印度国内的多种文学大奖。他的小说继承了普列姆昌德的现实主义传统，紧密联系社会实际，表现社会现实问题，贯穿他创作始终的基本思想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展现印度独立前后几十年人们的生存环境及其抗争，作品中刻画的主要是普通的工人、农民、职员形象，尤其是刻画了一批思想进步、主张民族团结、具有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艺术形象，在艺术上将历史真实性与文学虚构性有机结合，以现实主义的描绘和风格，对祖国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寄予极大的关注。创作于50年代的长篇小说《虚假的事实》（1957~1960）是耶谢巴尔的代表作，集中体现了他的创作特点。同时，这部作品也是东方摆脱西方殖民统治后，东方民族作家创作的后殖民文学的一部代表性作品，可以在后殖民语境中理解作品的内涵和意义。

## 一、主旋律：寻求独立后的民族自我

1947年8月15日《印度独立法》生效，英国在印度长达两个世纪的殖民统治结束了。独立前夕，印度国大党领导人尼赫鲁宣告：“很多年以前，我们曾发誓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今天，是到了我们实现诺言的时候了，虽不是完全实现，也是基本上实现。在夜半钟声敲响之际，当世界在酣睡之中，印度就将醒着迎接生活和自由。……一代不幸今日宣告结束，印度重新发现了自己。”<sup>②</sup>民族独立了，新生的独立印度进入“后殖民”时代，面临着与反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完全不同的新局面。这个“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印度，应以怎样的“民族自我”展现在未来的国际舞台？——富于社会使命感的耶谢巴尔，在长篇小说《虚假的事实》中，以其塑造的形象体系和艺术画面，做出了自己的探索。

《虚假的事实》上、下两卷、37章，是一部译为汉语32开本计有1346页的大

<sup>①</sup> 黄宝生：《印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2页。

<sup>②</sup> 尼赫鲁：《独立及其后》（1946-1949），陈君峰主编：《印度社会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6页。

长篇。小说的内容从1942年写起，止于1957年印度大选，时间跨度15年。这是印度历史上社会、文化转型变革的15年。

小说以中学教师拉姆卢帕亚和新印度出版社老板吉尔塔里拉尔两个家庭为中心。他们原来居住在拉合尔，印巴分治后迁徙到德里和贾朗达尔，以两家成员在印巴分治前后的经历为基本情节线索，描绘宏阔的社会场面，其内容纷繁丰富：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教育、新闻、出版、法律、人性、爱情、友谊、道德、妇女命运、人生经验等等，可以说无所不包，其场面大到中央政府决策、全民普选，小到商贩街头叫卖、孩子幼稚游戏；既有教派冲突杀人纵火的残酷场景，也有情人幽会卿卿我我的轻松画面。小说仿佛是一部庞大博杂的时代交响乐，各种音响、各种曲调融会其中，统一于整体结构。而贯穿小说始终的主旋律是：好不容易获得政治独立的印度应该怎么办？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国内民族、宗教矛盾冲突的多重缠绕中，怎样确立起真正的民族自我？重要的是“国家的未来”。

英国后殖民文学理论家艾勒克·博埃默（Elleke Boehmer）在其论著《殖民与后殖民文学》中写道：“所谓民族，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宽泛地表示对种族的界定，或根据所受到的民族压迫而界定的某个社会集团，但一般地说，所谓独立的民族国家，则被看作是受压迫的各民族所能自我实现的一种最完全的形式。……它存在于建设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心底，他们作为公民、士兵、报纸的读者、学生等等对他的体验和感受。因此，任何一个新的独立实体，都需要这个民族国家在人们的集体想象中重新加以建构；或者说，让这种属性化作新的象征形式。文学虚构叙述具有重新构筑现实的潜能，所以它为达到这一目的提供了一种丰富的媒介。”<sup>①</sup>《虚假的事实》就是耶谢巴尔以“文学虚构叙述”，来“重新建构”印度“民族自我”的一次努力。

当然，耶谢巴尔的“文学虚构叙述”和“民族自我”的“建构”，是以印度的历史和现实为出发点的。细读小说，我们可以由表及里地把握耶谢巴尔探索“民族自我”的出发点和基本思路：

第一，小说以浓墨重彩，甚至以一种报道式的文体风格再现印巴分治、教族冲突的灾难。疯狂的杀戮、无尽的暴力与苦难，一亿一千二百万人迁移家园、一百万人死于非命，十万妇女被掳掠强暴。这是印度历史上的大灾难，也是印度政治独立的代价。“印巴分治绝对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划分，或财物、资产和债务的分割。它同时也是，用幸存者反复使用的一句话说，是一种‘心灵的

<sup>①</sup> 艾勒克·博埃默著，盛宁、韩敏中译：《殖民与后殖民文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页。

分割’。它给在此之前凭借某种社会契约共同生活不同教派的信徒们带来了折磨、灾难、创伤、痛苦和暴行。它用一条武断确定的，有时甚至是连夜划分的边界拆散了无数的家庭，使人们根本无法知道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或孩子是生是死。”<sup>①</sup>对于这场灾难，小说中既有整体场面的概述，也有具体人物遭遇的生动描写。但作者不是以再现这场灾难为目的，而是以艺术画面探索分析：印度的独立为什么要付出这样的代价？这样的代价给独立后的印度以什么样的启示？这里有殖民统治者分治政策的责任，也是印度传统中的狭隘教族意识、落后的等级观念，和认识局限的遮蔽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第二，在耶谢巴尔看来，灾难已经发生，它是印度人民心灵中常在滴血的伤疤，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成为人们痛苦的记忆。但更重要的不是沉浸于灾难的回忆和哀伤当中，而是正视现实，吸取教训，振作起来，投入祖国未来的建设。耶谢巴尔甚至看到这场灾难客观上产生了冲击传统陋习和观念的效果，促进社会变革的意义。动荡中的财富重新分配，原来趾高气扬的富人没有了傲气，大家似乎更平等了（如伯父拉姆杰瓦亚）。小说中写道：“分治带来了极大的毁坏，然而那些把社会束缚得紧紧的陈习陋俗也就这样地被摧毁了，正如囚禁在某个监狱里的人在地震中虽然受了伤，但是监狱围墙的倒塌却使他们获得了自由。很多人死了，很多人因这种伤害而无法复元，可是看来现在旁遮普人更勇敢地站起来了。”<sup>②</sup>这种“破旧立新”的“革命”思想也许包含着耶谢巴尔政治观念的偏颇，但他的确由此看到了印度社会的进步和独立后的前途与希望。

第三，从1757年普拉西战役英国东印度公司控制孟加拉开始，英国对印度实行殖民统治。200年里，印度古老的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剧烈碰撞。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对抗与妥协的过程中，殖民统治与印度传统文化相杂糅；既非印度传统的、也非西方现代文明的一些文化“怪胎”出现了。如畸形的政治意识，个体意识膨胀带来的投机钻营等。这些文化“怪胎”成为分治暴乱的潜在动因，也成为独立后的民族发展的阻力。这种杂糅的殖民文化无论在殖民统治时期还是印度独立后，都使得一些民族知识分子感受到一种文化断裂和破碎记忆所造成的内在痛苦。从作品中吉尔塔里拉尔因女儿甘娜格的婚姻而产生的压抑和苦闷、布里独立前后的变化、性格中的矛盾（如诚实、妇女观等）都能清晰地看到这种“痛苦”。耶谢巴尔以艺术画面说明：政治上独立的印度，如何应对这些文化“怪胎”并加以剖析、清理，重新结构，最终整合成一种有利于印度进步繁荣的新的统一的文化。

① Urvashi Butalia: *The Other Side of Silence*. Penguin Books India Ltd.1988.p.7.

② 耶谢巴尔著，金鼎汉、沈家驹译：《虚假的事实》（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673页。

第四，民族独立了，新的国家也宣告成立了，过去为民族独立而奋斗的精英成了新政权的主宰者。他们过去的业绩换来了今天的权势。但他们是否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过去作为被压迫者的反抗斗争意志和高尚品格能否转化为今天作为领导者的服务民众的献身精神？小说中耶谢巴尔表达了他的疑问。从印巴分治导致暴乱过程中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领导人的作为看，耶谢巴尔对他们失望多于希望。多年的奋斗有了结果，他们似乎都在忙于胜利果实的分享和抢夺。至于把这胜利果实作为种子，播撒在印度大地上，以辛勤的耕耘换来整个印度的满园春色和果实飘香，让印度的普通民众都品尝胜利果实的甘甜，——他们似乎无暇顾及。他们急切地希望当年的付出得到补偿，独立的胜利似乎只是他们的胜利。这一点在旁遮普邦政府部长苏德这一形象的刻画中得到鲜明的表现。从纳罗德姆舅父村里的立法会议议员到政府总理都在耶谢巴尔的嘲讽揶揄之中。政府机关里逢迎拍马、虚伪欺诈、贪污贿赂。民众感到独立后和独立前没有什么变化，甚至感到更糟。“人们觉得，外国统治时期的敲诈勒索、物价飞涨和家庭生活的问题，在国大党统治的七八个月里显得更加突出。在外国统治时期，人们出于恐惧而默默无声地忍受着一切。而现在，人们不准再那样忍受下去了。人们说话了。他们开始气愤地说：……英国统治时期比现在要强。”<sup>①</sup>

## 二、达拉与布兰：理想民族自我的“寓言”

当然，耶谢巴尔绝不是赞成英国殖民统治。它只是立足于独立后的社会现实基础上寻求“民族自我”。这个“民族自我”，不是传统的民族自我，不是殖民统治下杂糅的民族自我，也不是创作当时的印度社会现实的自我，而是耶谢巴尔理想中的“民族自我”。综合分析小说中形象体系的建构及其价值体现，这个新的民族自我包括的品性与内涵似乎是：苦难后的觉醒、团结、平等、理性、奉献、自力更生、民众本位。

这些品性在女主人公达拉身上得到集中的表现。达拉是耶谢巴尔艺术构思中新的“民族自我”的化身。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在谈到后殖民时代“第三世界”文学时说：“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他还结合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他看到《狂人日记》中“那个病人从他的家庭和邻居的态度和举止中发现的吃人主义，也同时被鲁迅应用于整个中国社会：如果

<sup>①</sup> 耶谢巴尔著，金鼎汉、沈家驹译：《虚假的事实》（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386页。

吃人主义是‘寓意’的，那么，这种‘寓意’比本文字面上意思更为有力和确切。”而《阿Q正传》中的“阿Q成为关于某种中国式态度和行为的寓言”。<sup>①</sup>同样，《虚假的事实》中，达拉的经历和命运，也是印度民族的寓言，而且是寄寓着作者“理想民族自我”的寓言。

达拉是小说贯穿始终的主人公。小说从她十五岁生活在拉合尔波拉邦泰胡同一个贫穷家庭写起，到她三十岁居住德里，成为政府副部长，参与各种政治活动而结束。她的经历和命运，与印度社会这一时期的转型、动荡、变革、发展融为一体。作品中她十五年的生活经历了三个阶段：

分治暴乱前，达拉以一个美丽、聪明、善良、有主见、有抱负的姑娘出现在读者面前。她以优异成绩考进大学，虽然家境贫寒，却满怀对未来的憧憬，刻苦学习，准备学位考试。别的印度姑娘在这个年龄都在考虑订婚、嫁人，她却把精力用于学位考试，用于参加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与传统陋习的活动，她有自己追求。在学校她积极参加学生会的进步活动，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意识到：“我们的真正敌人是英国人，他们统治了我们国家。”<sup>②</sup>但就是这样一个出类拔萃的姑娘，她生存于积淀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氛围中，这种传统也是她必须背负的精神重负。

小说写她这一阶段的生活，主要描述她的一段不幸婚姻。印度传统的嫁妆制，使达拉贫穷的父母急于把女儿嫁给不要嫁妆的富家公子索姆拉杰。达拉自己倾慕的是大学同学、思想进步的穆斯林青年阿瑟德。她对父母安排的婚事，心中当然不满。开始她寄希望于哥哥出面反对；也曾与阿瑟德私议出走。但哥哥因自己的事业和恋爱受挫，无暇顾及她，阿瑟德又忙于反对教派冲突的大业而顾不上恋情。达拉面对强大的传统和习俗，她万般无奈，甚至想到过自杀。最终忍辱负重，被迫与她讨厌的索姆拉杰成婚。在新婚的当晚，她遭到残暴的索姆拉杰一顿暴打。

传统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既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财富，也可能成为民族发展的包袱。在民族文化的转型过程中，背负着传统的民族新生，往往伴随着痛苦和无奈。达拉对于传统婚姻的忍辱和无奈，恰恰印证了印度民族独立前夕的情景。

分治暴乱中，达拉从肉体到心灵都受到令人难以忍受的惨烈痛苦。1947年的暴乱，时间虽然只有几个月，但给印度和巴基斯坦人们的心灵留下的创伤是难以言说的，这是独立的印度、巴基斯坦分娩的阵痛。达拉几个月里经历痛苦，是

<sup>①</sup> 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239页。

<sup>②</sup> 耶谢巴尔著，金鼎汉、沈家驹译：《虚假的事实》（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页。

祖国母亲痛苦的具体化。新婚的当晚她被穆斯林强奸；被人贩子囚禁，遭受非人的折磨；被营救人员救出后，从故乡（拉合尔）来到祖国（德里），在难民营中遭人误解中伤。她失去了学业、失去了家、失去了爱、失去了生存的基本条件。但她极力维护自己的尊严，甚至以死抗争。

印度历史上悲惨又有几分悲壮的一页写在达拉的脸上和心上。

分治暴乱后，达拉以她的聪明能干和学识被人赏识，先在一家公馆做家庭教师，后被人推荐到难民营安置部担任主任助理，她工作勤奋踏实，为人亲和善良，坚持正义为难民办事实，在机关赢得人们的敬重。两年后，由于她的渊博学识和才能，被选拔进中央秘书处，被任命为副部长级的“妇女福利中心”主席。她身居高位，完全从灾难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把主要精力用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上。在贿赂成风、虚假浮夸、逢迎拍马的机关中，她沉稳谦逊、努力工作，以自己的精练才干、正直善良得到同僚的肯定和下属的赞许，她用平等的眼光看待部下和民众。工作和生活中屡有挫折，她都能以自己的坚强意志去面对，凭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去战胜。虽然她也有孤独、苦闷和忧伤的时候，但她从不狂躁怨愤，总是默默地勤奋服务社会和民众，以实绩来改善民众的生存条件，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而，她被人们赞誉：“姑娘真像是下凡人间的天神。她秉性温存，有一张笑容可掬、令人喜爱的纯朴的脸。”<sup>①</sup>

达拉任职政府部门所表现的种种品格，正是耶谢巴尔理想中的印度民族自我的体现。小说中还描写了大量与达拉相对的政府官员，他们贪污受贿，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他们拉帮结派，排除异己；他们弄虚作假，欺压百姓……毫无疑问，他们只会把从灾难中过来的印度导向新的灾难。只有达拉所代表的才是印度独立后的发展之途。

总之，达拉的经历和命运是印度民族的“寓言”式缩影：对于传统婚姻的忍辱负重、分治暴乱中的惨痛遭遇、在德里任职于政府部门表现出勤勉、温雅、自主、宽容、正直、清廉、仁慈。在这位当代“吉祥天女”的描绘中，寄寓着耶谢巴尔的社会理想。

达拉作为印度民族“寓言”式的形象加以塑造，这一点作者在作品中有过多次暗示。首先，小说中至少三次提到达拉是“女神”，这不是一般的赞美。在印度神话原型中，女神乌摩（Uma）是宇宙之母，后来演变成不同面貌、不同功能的众多女神。十九世纪后期印度教改革中有“新毗湿奴派”，其代表人物般吉姆“把女神作为印度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象征，如迦里女神作为印度民族受难的

<sup>①</sup> 耶谢巴尔著，金鼎汉、沈家驹译：《虚假的事实》（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454页。

象征和变革的力量源泉，把杜尔迦视为未来建立在爱人类基础上的复兴民族的象征”。<sup>①</sup>耶谢巴尔反复把达拉称为“女神”，包含着同样的象征内涵。其次，达拉经常对自己的经历和遭遇加以审察，在她的深思冥想中，作者总是让她将个人与民族、国家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彼此渗透：“……难道我的命运是早已注定的吗？国家是因为我的命运而分裂的吗？还是因为国家的命运使我遭受苦难呢？”<sup>②</sup>这样的联想，暗示出达拉与民族难分彼此的位相。再次，在达拉周围，经常有一批关注国家前途和命运的知识分子，对政府的决策、民族的未来展开不同观点的辩论，这时的达拉往往不参与辩驳，而是超脱出辩论双方，在一旁做全局性思考：“面临这样的时刻，达拉在思考一件事：人们为什么对未来没有信心？为什么会首先想到失败？……”<sup>③</sup>此时的达拉，俨然就是超出个体的民族理性的代表。

在后殖民文学中，女性往往被多重边缘化。但耶谢巴尔却是把女性解放作为印度社会变革的焦点来看待，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对妇女问题的探讨。分治暴乱中妇女的命运在《虚假的事实》中描写得最为感人。把达拉作为民族理想的象征加以刻画，表明耶谢巴尔高于一般的后殖民文学作家。

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纳特·布兰也寄托着作者的理想。布兰博士留学英国，敏锐博学，被认为是经济“天才”；他视野开阔、洞察世界风云，把握时代脉搏；能从现象透视本质，无论是作为中央政府的经济顾问起草全国经济计划，还是家庭婚姻关系的处理，他都理智而谦逊，清醒又不露锋芒。他的理性、睿智无疑是达拉所代表的“民族自我”的补充。他们最终的结合，也可以理解为新的“民族自我”的完善。

从这两个表达民族理想的形象的刻画，可以看到耶谢巴尔寻求新的“民族自我”，是把印度传统文化的精华与人类优秀文化加以整合的一种努力，虽然以艺术形象表达的“能指”意义有些模糊，但毕竟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 三、创作构思：突显民族自我

东方的后殖民文学，作为殖民统治崩溃后关注民族前途和命运的文学创作，一方面有着民族独立后的欢欣，另一方面又有着民族发展的深层忧虑。毕竟，刚独立的民族面临着太多的问题。因而，富于民族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作家，往往表现出急切甚至焦虑的心境。同时，与殖民统治时期相比，反对异族统治，要求民

<sup>①</sup> 林承节：《印度近现代史》，北京大学出版 1995 年，第 41 页。

<sup>②</sup> 耶谢巴尔著，金鼎汉、沈家驹译：《虚假的事实》（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04 页。

<sup>③</sup> 同上，第 724 页。

族独立解放的政治诉求已成过去。现在需要的是唤起国民的主人翁意识，清除殖民时期精神奴役遗留的负面影响，确立起民族发展的信心；以民族本土文化为根基，整合民族传统和外来文化的精华，确立新的民族文化坐标。这种种心境和愿望表现在文学创作的构思中，往往与探寻新的“民族自我”主题表达相应，形成一些特定的要素。《虚假的事实》有四点很突出。

其一，在历史的框架中虚构情节。作品在印巴分治前后的系列历史事件中描绘虚构人物的遭遇和命运，展开各种现实问题的分析与讨论。作者在小说的前面有对书名加以解释的题词和说明，其中写道：“我用虚构的方式写出事实，把它奉献给人民群众。他们虽然经常受到欺骗，但从未失去追求事实的信心与勇气。”“书中描写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但是，全书的整个故事情节是虚构的，它是小说而不是历史。书中所有的人物也都是虚构的，如达拉、布里、甘娜格、吉尔、纳特博士、奈耶尔、苏德、索姆拉杰、拉瓦德、伊沙格、阿瑟德和总理等。”<sup>①</sup>的确，小说通过报纸社论、人们的议论或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描述了基杰尔内阁辞职、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就分治问题的交涉、蒙巴顿方案、分治暴乱、甘地被刺、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全国大选等一系列历史事件。而在这样的历史框架下，具体人物的行为方式、情感纠葛、遭遇命运却都是虚构的。

这种民族历史事件的框架容易唤起民族成员的集体意识，获得大众的认同。具体情节的虚构可以摆脱历史事实的束缚，把作家主体的理想愿望、思想观念加以强调或者突出。这是东方后殖民文学最常见的文学构思模式。印尼慕依斯的《苏巴拉蒂》、埃及西巴依的《回来吧，我的心》、马哈福兹的《三部曲》以及缅甸吴登佩敏的《旭日冉冉》等都是这类作品。

其二，民族知识分子的聚会。民族知识分子是民族的精英，他们的见识和智慧是民族建设与发展的宝贵财富。作家的观念或困惑，往往通过他们的口来表述。《虚假的事实》中不论在拉合尔还是在德里，都有几个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尽管这些知识分子的观念不一，精神境界也有不同层次，但他们以各种不同方式经常聚在一起，对现实中的问题展开争论、探讨，使作品具有强烈的政论色彩，这也是耶谢巴尔创作具有现实关怀的体现。虽然有时有损小说的艺术魅力，但对引导大众的思想，促进现实变革具有积极作用。

其三，本土风习的描写。在描写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政治问题的同时，小说还注重渗透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本土风习描写。合十触脚的日常礼节，念经斋戒的宗教习俗，哭丧祭奠的丧葬风习，婚嫁迎娶的风情场景等等，作品中有大量的

<sup>①</sup> 耶谢巴尔著，金鼎汉、沈家驹译：《虚假的事实》（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前附页。

描写。还有一些极具民族风情的生活细节，如新婚姑娘染姜黄和桃金娘，用七个辣椒敲头以禳灾等。这些本土习俗风情的描写，一方面加强作品的生活气息，产生真实的艺术感受；另一方面也给本民族的读者以文化的亲近感，有着弘扬民族文化的作用。

《虚假的事实》中的风习描写有一个突出的特点：耶谢巴尔不像印度现代的许多作家那样——描绘种姓制度、寡妇殉焚、母牛崇拜等传统习俗，揭示这些习俗给印度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而是与“寻求民族自我”的主旨一致，着重发掘本土风习资源中的正面因素，尤其突出“同甘共苦、团结互助”的内涵。一家来了客人，邻里街坊都送菜招待客人；一家有人去世，不同种姓的熟识妇女都在一起哭丧吊唁；一家有姑娘出嫁，邻家姑娘大嫂都来欢唱祝喜歌。小说中以较多的篇幅，描写了两场哭丧祭奠（小说开篇达拉的祖母去世的祭奠、本蒂等人为暴乱中死去的邻居瑟多的哭丧），两场婚嫁迎亲（达拉的婚嫁和西达的婚嫁），其中都透射出耶谢巴尔的良苦用心：用纯朴的民情风习，对比分治暴乱的宗教仇杀，呼唤团结奋斗、共同建设祖国未来的民族精神。

其四，坚信前程美好的结尾。东方后殖民文学的作家在民族独立的前提下探索民族的前景，虽然有着内在的焦灼，但对新的民族自我确立有着坚定的信念。他们的创作还往往自觉承担起振兴民族信心的责任。《虚假的事实》的结局，布兰和达拉历经坎坷，终成眷属，而且挫败了苏德和布里陷害他们的阴谋，专横自负的苏德在大选中败北。作者在这里显示了民众的力量：“人民并不是死气沉沉的，人民也不是永远默不作声的。国家的未来并不掌握在领袖们和部长们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全国人民的手里。”<sup>①</sup>

《虚假的事实》是印度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也是耶谢巴尔的一次精神旅程：由殖民统治走向民族独立，由噩梦般的悲惨走向光明幸福的未来，由官僚统治走向民众自主——尽管现实与美好愿望还有距离，但文学创作应该有这样的向往。文学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现实文化的先导。

[责任编辑：李丽]

<sup>①</sup> 耶谢巴尔著，金鼎汉、沈家驹译：《虚假的事实》（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792页。